



Cross-cultural Dialogues

主编
[中] 乐黛云
[法] 李比雄

执行主编
钱林森

关于文化身份的对话
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身份

9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责任伦理
选择和平 拒绝战争

跨文化对话



郑和航海与哥伦布航海
寻觅大自然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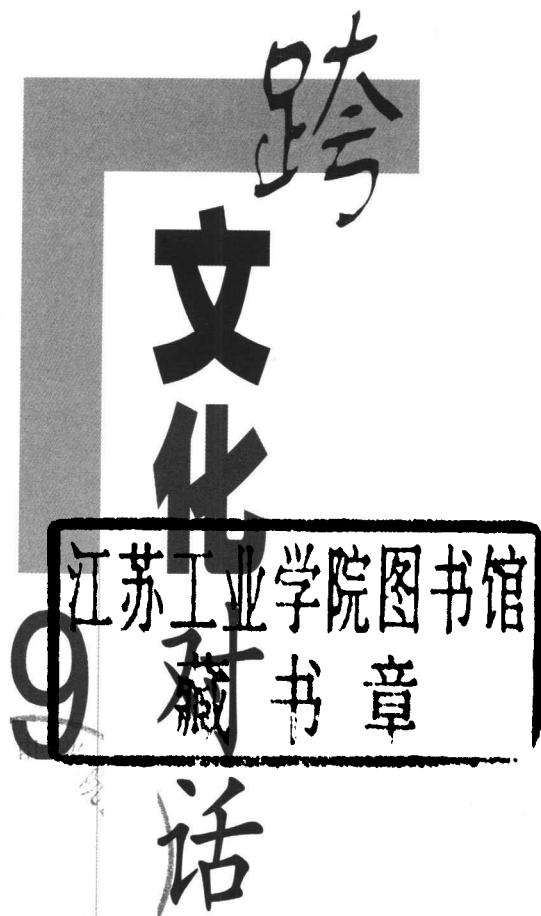
Transculture|

G04-53

L074

主编
[中] 乐黛云
[法] 李比雄

执行主编
钱林森



8974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对话.9/乐黛云等主编.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7

ISBN 7 - 80646 - 441 - 7

I . 跨… II . 乐… III . 比较文化 - 研究 - 文集 IV . G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7506 号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陆震伟

跨文化对话(九)

乐黛云等 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 海 绍 兴 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lcn.com

乐 黛 云 店 经 销

上 海 港 东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640×935 1/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165,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46 - 441 - 7 / I · 396

定 价：1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 - 59671164

《跨文化对话》

由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
与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

并列入法国夏尔 - 雷奥波 · 马耶
人类进步基金会(FPH)

面向未来的文化向文库

《跨文化对话》学术委员会成员 (以音序排列)

中国委员

- 丁光训 南京大学前副校长,金陵神学院院长,宗教学家,教授
丁石孙 北京大学前校长,数学家,教授
季羡林 北京大学前副校长,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印度学专家,语言学家,教授
李慎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国际问题专家,教授
厉以宁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教授
庞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教授
任继愈 北京图书馆馆长,哲学家,教授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家,教授
王元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张岱年 中国孔子学会会长,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张维 清华大学前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学家,教授

西方委员

- Mike Cooley 英国布莱顿大学技术科学委员会主席
Antoine Danchin 法国巴斯德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生物学教授
Umberto Eco 意大利波洛那大学哲学系教授,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哲学家
Xavier le Pichon 法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地质地理系主任、教授
Jacques Louis Lions 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数学系主任、教授
Carmelo Lison Tolosana 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孔普鲁登塞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
Alain Rey 法国词典学家,国际词典学联合会主席

《跨文化对话》编辑委员会成员

主编 乐黛云教授(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电话与传真: (010)62752964 E-mail: Tyjydy@ pku. edu. cn

主编 李比雄教授(Alain Le Pichon,欧洲跨文化研究院)

通讯地址:Universite de Cergy – Pontoise, 33bd du port 95011
Cergy – Pontoise

电话: 0033 – 1 – 34256166 传真: 0033 – 1 – 34256267

E-mail: lepichon@ paris. u – cergy. fr

执行主编 钱林森教授(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电话: (025)6206233 传真: (025)3309703

E-mail: linsenqian@ hotmail. com

执行副主编 郝铭鉴编审(上海文化出版社)

通讯地址:中国 上海 200020,绍兴路 74 号

电话: (021)64372608 传真: (021)64332019

E-mail: csbcm@ public1. sta. net. cn

编委会巴黎联络处主任 金丝燕博士、副教授(Dr. Jin Siyan,

法国阿尔瓦德大学)

通讯地址: 15 Rue Victor Cousin, 75005 Paris, France

电话: 0033 – 1 – 56240483 传真: 0033 – 1 – 56240921

E-mail: jinsiyuan57@ aol. com

执行编辑 李国强副编审(上海文化出版社)

通讯地址:中国 上海 200020,绍兴路 74 号

电话: (021)64372608 传真: (021)64332019

E-mail: Liguoqiang46@ yahoo. com. cn

卷首语

乐黛云

[法]阿兰·李比雄

1988年就已开始筹划的“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终于在2001年12月于法国北部城市里尔庄严召开了。里尔，这是国际歌第一次响起的地方！大会宣言指出：“我们痛苦地面对三个主要的不平衡：地球南北之间、社会内部贫富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假如我们的世界继续以其现有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人类将自我毁灭，我们拒绝这一前景。”为此，大会号召：必须深刻地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社会。应该说，这的确代表了当前世界有识之士的心声。本辑独家发表了大会策划者和组织者，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姆和金丝燕的对话，对大会做了详尽的阐释。会上，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指出，必须有“来自公民运动的不断加强的压力”，才会出现一种“民主和平的世界管理”；秦晖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提出“多元文化认同是一种新的人权”，并分析了两种全球化的前景，都十分发人深思。显然，这次大会将作为新世纪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载入史册。

为了纪念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辞世，特邀杜小真教授首次译出了他在被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授予金质奖章时接受访谈的记录。本期发表的专论《理解与接受》是在国际学术界已颇负盛名的青年哲学家赵汀阳在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赵汀阳首先指出我们目前讨论的不只是“知识共同体内部的对话而且是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对话”。他研究了“他者”的切实涵义，分析了“理解和接受”，“发言与倾听”的关系；指出当前思想的“问题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于“主体性”向“他性”的转化，“对话”已不是希腊式的“智者对话”，也不是以一方覆盖另一方的“政治对话”，而应是使各种文化都能通过“对话”而获得思想新资源从而开启某种新文化的生成过程。这种“对话”寻求的是互惠的文化建构而不是作为惟一答案的“普遍真理”，因此，“不仅要宽容他者的存在，而且要承认他者的思维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一种不断“相互接受的过程”，使人类的思想结构有新的发展。赵汀阳关于当前思想哲学现状的研究已引起不少国外哲学家的关注。

本期“要籍时评”介绍的《诗学史》，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几位前主席主编，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顶尖学者的精心之作，规模宏大，议论深入，系统全面地分析了截止于19世纪的西方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很值得一读。韩国学者宋荣培教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在韩国出版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教授对此做了精彩的介绍。另外，“说东道西”和“文化随笔”两栏都很有可读的文章。本期的《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身份（认同）》也是一篇极富特色的文章，值得推荐。

本辑作者介绍

皮埃尔·卡兰姆 Pierre Calame(法国) 法国夏尔·雷奥波·马耶 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	钱林森(中国) 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 化研究所教授
金丝燕(法国) 法国阿尔瓦德大学副教授	赵汀阳(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研究员
米歇尔·罗卡尔 Monsieur Michel Rocard(法国) 法国前总理	王宾(中国) 中山大学英语系教授
陈彦(法国) 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伊万·达尼埃尔 Yvan Daniel(法国) 法国拉罗舍尔大学法文系 副教授
张炜(中国) 作家	周桂钿(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 教授
秦晖(中国)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褚孝泉(中国) 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张沛(中国) 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后	丁帆(中国)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副 主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于硕(法国) 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博士, 欧中城市经验交流中心负责人	黄巧灵(中国) 杭州宋城集团董事长
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法国) 法国已故社会学家	叶维廉(美国) 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教授
张裕禾(加拿大) 加拿大魁北克舍布鲁克大 学历史系教授	王宁(中国)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

目 录

卷首语	乐黛云
[法]阿兰·李比雄	
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	
“第一届里尔世界公民大会”专辑	
法国夏尔-雷奥波·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兰姆访谈录	[法]卡兰姆/[法]金丝燕(1)
选择和平 拒绝战争	[法]米歇尔·罗卡尔(25)
“第一届里尔世界公民大会”述评	[法]陈彦(28)
责任、理性和浪漫	张炜(34)
多元文化认同,一种新的人权	
——在第一届里尔世界公民大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秦晖(38)
责任:新世纪的人类伦理	张沛(40)
寻找人类	
——里尔世界公民大会随笔	[法]于硕(46)
海外专递	
必须重建一种过去百科全书派那样的集体知识分子的模式	
——皮埃尔·布尔迪厄访谈录	杜小真译(60)

前沿碰撞

关于文化身份的对话

[加拿大]张裕禾/钱林森(67)

专论

理解与接受

赵汀阳(76)

新论快览

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身份(认同)

王 宾(100)

文化透视

克洛岱尔和中国文化

[法]伊万·达尼埃尔(126)

说东道西

郑和航海与哥伦布航海

周桂钿(143)

在古今东西之间

褚孝泉(149)

文化随笔

寻觅大自然的生命

丁 帆(158)

坐在地球上

黄巧灵(162)

要籍时评

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读后感

[美]叶维廉(164)

亟须一种修正思维

——读贝西埃等主编《诗学史》有感

王 宁(173)

●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

“第一届里尔世界公民大会”专辑

法国夏尔 - 雷奥波 · 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
皮埃尔 · 卡兰姆访谈录

2002年1月

[法]皮埃尔 · 卡兰姆/[法]金丝燕

[访谈使用语言为法语,本访谈录系根据法文记录稿译出]

金丝燕:我自1996年以来一直参与夏尔 - 雷奥波 · 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工作,2001年12月又参加了在法国里尔(Lille)举行的世界公民大会。我有时自己问自己,当今的时代到底是处于一个曾被预示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处于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社会模式之中?对于只经历过二十世纪那种不容置辩的“非是即非”式的排他性、淘汰性甚至极权性的革命运动的我来说,我为这种也许即将诞生于我们地球上的新的社会模式感到高兴,并受到鼓舞。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皮埃尔 · 卡兰姆先生,您作为这种模式的创始者之一,您如何看待这一模式?您的介入的动机又是什么?

皮埃尔 · 卡兰姆:我毕业于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拥有路桥总工程师职称,曾在法国政府装备部担任过二十年法国人所说的高级行政官员。我之所以走上这一道路,是因为我历来对社会管理问题感兴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我曾任法国北部一个大区的装备局负责人。当时这一地区正面临痛苦的产业转型,我意识到这种转型也意味着一些将需要很长时期才会产生的文化和制度发生变化。我在我的《可能的使命》这本书中所谈的“时差理论”的发现便由此而来。在我们这一同时是社会文化、生态和技术系统的复杂社会中,社会变革因科学技术转变而愈来愈快。但是,思想、价值、教育体系以及一切政治与社会调节机制的演变却要缓慢得多。于是,

便造成一些深深的不平衡；因为我们试图用昨天的思想来思考明天的世界，并使用前天的制度机构来对其进行管理。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逐渐明白：这一从法国一个特定地区的产业转型中观察到的时差状况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则更为真实。从长远看，这将使我们遇到一个致命的风险，愈演愈烈的生态失衡便是一个明证。我们依然若无其事地行事，仿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会自然导致人类的进步，而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不断发现科技也可能带来灾难和失衡。我们依然依照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前产生的观念行事，仿佛仅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便足以对全球化的现实进行管理。然而，恰恰正是不能再以国家作为尺度和范围来提出这些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于 1988 年放弃升任全国城市规划司司长的机会，离开了国家公职部门，全身心地投入了我原来已任董事的夏尔 - 雷奥波 · 马耶基金会的工作。因为，像基金会这样的独立空间极为必要，尤其是为了促进——哪怕以微不足道的方式——这一业已成为人类当务之急的思想和制度的重建。

金丝燕：“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存在已近十五年。1988 年，法国威泽雷（VEZELAY）小组发出支持“全球三级会议”的呼吁。这一“三级会议（ETATS GENERAUX）”的想法即是联盟的起因。您能不能就这一想法和这一事件给我们作些说明？

皮埃尔 · 卡兰姆：1987 年，我向威泽雷小组提出了这一地球“三级会议”的想法。它的参照是法国的一个历史事实：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迫于难以解决的财政危机，于 1788 年召集了全国三级会议。这曾是一个古老的解决危机机制：由国王召集一次代表社会各不同等级的显贵会议，作出特殊决定。1789 年全国三级会议召开。社会各界的代表分成三个等级：贵族、教士以及事实上代表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所谓第三等级；而前两个等级所代表的是政治、军事和行政权力。全国三级会议使第三等级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严峻地发现国家组织方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法国大革命便由此而爆发。当然，“三级会议”这一想法令我感兴趣的

并不是它的革命性以及相关的暴力和绝境，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遇到危机形势时，必须使社会不同有生力量依照不同于社会平常管理的方式进行对话。然而，1987年时，威泽雷小组已经完成了对我们目前发展模式的失衡与绝境的初步分析。该分析使我们坚信二十一世纪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动，但是，思想体系、制度和既成权力尚未作好设计与领导这种大规模变动的准备。在同一时期，1992年里约全球高峰会议已开始筹备，我们意识到那最终不过是一次国家间的会议，尽管有其意义，但还是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一种全然不同的做法，即仿效两百年以前，也即1788年发生在法国的史实，召集一次全球范围的“三级会议”。这便是“全球三级会议”想法的由来。

金丝燕：这一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自下而上”的方法使我想起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在社会运动中采用的做法。人们可以认为这一法国式的方法甚至对中国社会的演变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这似乎也是联盟的方法。您觉得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是一种能使社会不同阶层对其他阶层的分析和前景进行对照的方法？或者说，它是否也反映了一种新的哲学前景，即：与萨特所说的正好相反，“他人”不是地狱，而是“自我”存在的前提。它是否意味着答案不在自己本身，而在他人？如是这样，那么“本身”的角色又是什么？

皮埃尔·卡兰姆：“三级会议”的想法包含两个特别有意思层面：一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二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话和较量。

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具体表现为各地起草的《陈情书》。如运用至全球范围，这一想法则意味着必须从当地情形出发，把握当代社会的各种挑战和差异。自上而下的关于全球化的惟一真理是不存在的；只有每个社会对其自身转变的理解以及每个社会对其自身被愈来愈全球化的技术、文化、生态和经济转变所贯穿的方式的把握。一个体系愈是复杂，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则愈是关键。而这些关系又只能以其当地的具体形式才能得到理解。所以，我总是强调对社会及其问题进行地域性探索的重要

性。换句话说，应当学会“用双脚思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非政府组织界流行一句表达世界相互依赖现实的很得人心的口号：“从全球思考，在当地行动。”我认为这口号很不足取，甚至有点危险，因为我们不知道是由谁来代替我们从全球思考。我觉得差不多该倒过来说才对：由我们依照自己的现实从当地思考，以达到在全球行动；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转变将是全球规模的。

至于不同阶层间的对话，大革命前的法国是透过全国三级大会的贵族、教士和资产者这“三个等级”得到体现的。而思考全球三级大会，则应扩大这一视角：社会由非常多样化的社会与职业阶层构成，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可赋予一种与其他阶层极少对话的特殊的眼光、特殊的观点。我甚至可说得更重：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远距离通信系统的发展，某些阶层内部的国际对话愈来愈频繁，但不同阶层间的对话却相反愈来愈少。这便是我所说的“琴管式社会”：每一琴管是一个国际范围的阶层，但琴管与琴管之间的交流却不存在。因此，在后来形成的“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社会”联盟的框架中，我们提出一项世界的倡议，尤其是建立包括从艺术家到农民、从军人到宗教领袖、从工会活动分子到企业家的各种社会职业会议团体。每个阶层拟从全球角度形成其观点，并承认在对付共同挑战中应担当的责任。这是在不同阶层之间建立对话的先决条件。没有哪一个单独阶层拥有解决方案。普通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经常建立在这些阶层之间的纷争之上，因而，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的分歧，例如：雇主与工会、国家与公民社会等各方面，都受到某种类似于冲突和战争逻辑的支配，各自不是把其观点简单化，便是声称垄断真理。如同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 (Michel Rocard) 在世界公民大会开幕式上所说的那样，战争方案总比和平方案来得简单，而接受与他人对话、承认他人的需求、承认他人拥有的真理、与他人一起寻求共同因素，这些都是建设和平的基本要素。除和平之外我们别无他路，就像刚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那样。欧洲建设首先并不是一项经济发展计划，而是一项和平计划。

金丝燕：能不能请您谈谈“地球村”说法的危险？

皮埃尔·卡兰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为了强调人类社会之间以及人类与生物圈之间愈来愈强烈的相互依赖关系，人们便开始津津乐道于“地球村”。这一形象固然有其吸引人之处，但也可能隐含危险。因为一个村子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相互认识，通常分享同一种文化，知道如何共同管理当地环境，善于分享资源，并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调节和重新分配规则。然而，这一切在全球层次上其实并不存在。人们所谓的地球村中的不平等正愈演愈烈，且不具备重新分配机制；它由一些事实上并不互相了解的人民组成；而且也还没有确立保障长期生存所必需的社会与政治调节规则。我同意作为有待长期建设的过程的地球村，而且我坚信，一个具有自身意识并为世界民主优化管理创造条件的国际社会的崛起，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主要前景。但相反，如把“地球村”当作一个业已存在的现实，则落入了认同那几个把全球化与经济整体化相混淆的国家的现行统治的圈套。当老布什在 1992 年全球高峰会议上解释美国生活方式不可谈判的时候，他其实是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地球村并不存在。在有待建设的国际社会中，对美国生活方式当然必须得重新谈判。

金丝燕：强调统一性的世界相互依存原则是否应该以对多样性的承认来补充？如何来解释这种多样性？

皮埃尔·卡兰姆：我曾对人们所说的“优化管理(gouverance)”作过思考；这一概念指的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建立一个社会为了保证持久和平、生存及长期发展所应具备的文化、社会、政治及制度调节机制。如果我得用一句话来定义优化管理艺术的话，那么，它便是一种在某一社会中同时达到更统一和更多样的艺术。表面看来，统一性与多样性似乎难以调和，就如同要求在“为了团体生存而放弃自由”与“不惜以混乱为代价来促进自由”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一样。优化管理艺术则相反是说：自主性有权得到表达，并能丰富整个共同体，但其前提是须在有利于顾全相互依存关系和保障统一性的共同制度与规则范围内进行表达。我们在自然界也可看到这一点：丰富与平衡的生态系统并不是由全部相同的成分构

成，而是恰恰相反，是由一些极其多样并相互平衡影响——包括相互冲突——的因素组成。同样，我不认为明天的国际社会需要某种文化、经济或政治的均一性才能建立。曾经是“联盟”起点的“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纲领开宗明义便确认：我们的世界既深深地相互依存，又因其多样性而得到丰富。我们应当建立的恰恰就是这种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新型关系。

金丝燕：您曾出版过一本题为《心中的国家》的书。该书的主旨是否和“三级会议”相吻合？“三级会议”是否应结合地缘文化、会议团体和主题性这三条共同“道路”的前景进行筹备？

皮埃尔·卡兰姆：《心中的国家》一书主要探讨的不是“三级会议”，而是优化管理问题。而且该书的副标题是：“优化管理的机械师”。“机械师”是一种法国的构造玩具，我这一代人都很熟悉，其内容是使用一些数目有限的标准零件来构造出复杂的机器。《心中的国家》起初只涉及法国的国家改革，而且以我自己的公务员经历以及我的同事、该书的共同作者安德烈·达尔芒（André Talmant）的亲身经历作为基础。然而，从一种很明确的思考——即应当脚踏实地地思想——出发，并从行政部门的日常现实中，我们意识到了某些优化管理普遍原则的存在。这些原则甚至都具有双重普遍性：它们既存在于优化管理从当地到全球的每一个层次，又出现于各自差异很大的文化背景之中。也正由于如此，在筹备世界公民大会时，我起草了一篇关于优化管理公共原则的文章。《心中的国家》自1997年在法国问世后，又相继出版了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版；汉语版也正在翻译中。这本书可谓是经历了一个奇特的命运，因为起初我们认为它只能被那些熟谙法国行政运作及其改革之难（尽管其官僚主义流弊被屡屡揭露）的读者所理解。然而，事实却是：埃及人、黎巴嫩人、巴西人或中国人都从该书的描述中辨认出了各自国家的现实！

我们把该书定名为《心中的国家》，主要想表达两层意思：一是：国家和公共管理是我们公务员心中所珍视的东西；没有一个公正而有责任意识的公职部门，便不可能对社会进行合适的管理；二

是：国家也处于当前社会的中心地位，并从更广义上说，优化管理改革是当今世界挑战的中心。

金丝燕：2001年12月2日至10日在法国里尔市举行的“世界公民大会”是以一系列围绕职业、主题和地区三大轴心展开的研讨组工作为基础的。这次大会是不是已经体现了为全球三级大会而设计的这三条道路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公民大会是不是“全球三级大会”的某种成就？

皮埃尔·卡兰姆：里尔世界公民大会及此前整整七年的酝酿筹备倒确实可以说是“全球三级大会”这一原始设想的具体化。自从1990年初我们实际从国际范围展开工作以来，我们便发现“全球三级会议”的概念无法翻译成汉语、俄语、甚至英语，因为它的参照是法国历史的特定现实。在所有懂法语的人中，无论是非洲人、亚洲人，还是欧洲人，只有具备了法国历史的基础知识，才会对这一概念多多少少感到熟悉；但对于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却并非如此。因此，我们改换了说法，因为我们发现，在大多数社会里，即便不存在“三级会议”这一词汇，但在危机时代，都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对话形式。不过我们保留了方法基础，并确认应当通过三条趋同的道路来筹备我们此后称为“全球公民大会”的集会，即：以情境多样性为出发点的地缘文化道路、以社会职业阶层多样性为出发点的合议团体道路以及以挑战多样性为出发点的主题性道路。我们按此精神作了七年筹备，不断扩大网络，发展各种合议团体，并草拟提案书。世界公民大会既是一个汇集这种种努力的手段（例如，在会议前，共起草完成了六十份大多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提案书），又是一个“联盟”第一阶段工作结束的象征和一个“全球议会”的初步预示；它也是对代表全球社会广泛多样性的与会者在一起就共同面临的挑战进行对话的能力的一次测试。

金丝燕：世界公民大会曾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您个人又曾面临何种挑战？

皮埃尔·卡兰姆：世界公民大会的组织与举行曾迫使我们应因为数众多的挑战并开拓各种创新思路。我可以把这些挑战归纳